

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阅读写作生涯中,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63年纽约市几大日报大罢工。报纸全面性大罢工造成纽约市经济衰落,影响了不少人的生计,因为没有报纸广告,百货商场无人光顾,电影院与百老汇剧场门可罗雀,而我们这些每日必须读报的读书人,更无处获知突发新闻。

我记得大罢工一共历时114天之久,小报《每日镜报》因此关闭。另一份著名的、可与《纽约时报》竞争的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,1967年也因工会罢工在经历合并等各种努力后关闭。许多报人失业,特别令人惋惜的是《先驱论坛报》几位名记者突然无影无踪。在罢工期间,我最挂挂的是《纽约时报》周末的《书评周刊》。我们读书人都有相同感觉,没有《书评周刊》中的书评与书局广告,何从了解出版的新书?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出了新书,无人问津,以致阻碍了他们后来的写作生涯,即使是名作家的作品也乏人问津。

我记得,当时确有几本书虽无书评介绍,也上了出版界畅销书榜好几个星期,那都是因为听人传言而畅销,其中有德国作家格拉斯的《铁皮鼓》,美国女权作家弗里丹的《女性的奥秘》,索尔仁尼琴的《伊文·敦尼索维支的一天生活》等。大罢工结束后的4月7日那天,第一本复刊的《纽约时报·书评周刊》大载特载过去几周遗漏的新书新闻,结果上述几本书都极为畅销,索尔仁尼琴与格拉斯后来也获了诺贝尔奖。

另有写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(先友施成荣译为中文)一书的著名作家J·D·塞林格,其时也有新书出版,则被人忽视。其他名作家如约翰·厄普代克与詹姆斯·鲍德温的新作因他们的名气,销路未受影响。

我之回忆50年前旧事,是因为想到文人与作家成名之难。有几位朋友向我诉苦,当年他们的作品已被《纽约时报》专论版接受,但因报业罢工而不能及时发表,因而失去了成名机会。写书的作家们更觉苦恼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著名的《纽约书评》双周刊(New York Review of Books)应运而生,它目前已成为可与《纽约时报书评》相抗衡的美国最重要的书评刊物。当时报业罢工,令一些作家与书评家非常苦闷,乃一起集资自办了这本书评刊物,主编者为罗勃特·西尔威斯(Robert Silvers),副主编为芭芭拉·埃浦斯坦(Barbara Epstein)。在该刊旗下,聚集了一批苦于无处发表言论的书评家,他们甚至借书评来发表长篇时论,态度往往左倾,多为自由派,一时销路大增,甚至可与复刊后的《纽约时报》书评周刊竞争广告。此刊物两位创刊主编都已逝世,但刊物仍在,而且可以盈利。一度曾被一富有报人出资500万美元购去,主编者与重要撰稿人每人分得50万美元报酬,成为文坛佳话。

书评对新书的销路极具影响。我不想想到自己去年在纪念90生辰时所出几本新书。编辑告我,她曾邀请国内友人撰文推荐,据说我的朋友王蒙与沈昌文等推忙而谢却,我当然很感失望。不过特别令我失望的是国外几位朋友,先说要我送书作评,数月后,尚无音讯。

除此之外,最令我奇怪的是,有一天我去华埠新华书店闲荡,未见新书陈列,向店员询问,他瞠目不知。在国内,亲友们曾去上海一大书店询问,店员要打开电脑才能觅得我的新作。香港一位朋友倒在书局见到。出版商不做广告,又无书评,怎可推销新书?我所说的是出版界的生意经,至于文友收到新书后不愿作文介绍,那是另一回事。

2008年5月的一个晚上,英国南威尔士紧急报警电话系统接到一名当地男子打来的电话。此人紧张地表示,在夜空中发现了一个UFO。话务员立即和一名值勤的南威尔士巡逻警官取得了联系,让他迅速到这名男子家附近看看那个天空中的“UFO”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结果这个UFO的秘密很快就被解开了,不过让999话务员目瞪口呆的是,那个UFO原来只是一轮月亮!

2008年11月以来,上海UFO探索研究中心(前身为上海UFO研究会)等各地UFO研究团体和北京UFO研究会论坛等相关网站收到了数十起关于在西南方向发现疑似UFO的报告。

11月9日,家住上海浦东菊园的龚先生向上海UFO探索研究中心报告,称其和家人在当晚5时至7时,发现西南天空出现两个不明发光物体,亮度特别亮,疑为UFO“光临”上海。嗣后,各地发现UFO的新闻此起彼伏。11月27日傍晚7时许,成都有众多市民报料,西南

安徽望江县一起违规任职,资格造假事件,让人看清了“借破格之名,行谋私之实”的全过程。毕业半年就加升两级的22岁共青团望江县委副书记常骏生隐瞒实际情况,经过曲曲折折的手法,在各方帮衬下,达到“破格提拔”。其中,牵涉到编制办主任、人社局局长、人才交流中心主任、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,包括县公选工作考察组成员和县信访办副主任等等。在舆论的关注下,最终给出了从严从重的处理决定。

然而,此类“借破格之名,行谋私之实”的案例,决非个案,譬如“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”,“广东揭阳27岁副区长江中咏”等类似事件,也是舆论广泛关注的。

以往,像这类“封妻荫子”的现象,在我们存在封建习气的社会里,还真不少。在20多年前,曾读赵超构(林放)所写《“父子军”与“夫妻店”》一文,讲的是山西繁峙县有十一个局级行政、事业单位的十七名正副局级干部,把他们二十三名家属子女安插在自己所在单位工作。这就使亲属关系与领导被领导关系变得盘根错节,十分复杂。将革命的组织关系换成了“父子军”和“夫妻店”的关系。这正是封建习气在腐蚀我们的政权机构。多少年过去了,赵超老讲的这种“封妻荫子”的裙带

仔细看台北的地铁路网图,仿佛像一头任劳任怨的骆驼,头朝右,前脚着地,后面三条腿有力地支撑着。驼峰上有向上和朝左延伸的线网。不要看台北市人口近300万,地铁线网总长度100公里,但至今年3月,台北捷运运量,每日平均达175.3万人次。况且,台北市的地铁与公交、“市民小巴”、出租车等地面公共交通,已经实现十分方便的换乘对接。

我是乘飞机到达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松山机场的。想不到,跨出机场出口,迎面的左边几步路就是标有台北捷运的地铁站。我花25元新台币购票,去忠孝复兴地铁站再换蓝色线到台北车站。台北的地铁与上海一样,不同线路是按不同颜色标明。票价也差不多。当然,如按人均收入比,就有一些差距了。已经是晚上6点左右,台北地铁也迎来乘车高峰。乘客十分安静。大家有序地在排队候车。到达忠孝复兴换乘站,大厅内有执勤的两名服务



方向突然发现了两颗白点,这两颗亮点挨得很近,相互辉映着久久不肯离去,持续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。同日6时,家住北京南三环刘家窑附近的市民在自家阳台上,突然看见西南方向的天空中有些“异常”,“漆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光点,它们一明一暗呈倾斜状上下排列,亮度要比周围的星星强很多,下面的光点尤其明亮”。

那么,先后被各地公众目击到的UFO究竟是什么神秘物体呢?

其实,这些出现在上海等地上空的不是什么UFO,就是普通的星体——而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金星和木星。

我们知道由于金星本身不发光,是靠反射太阳光发光,所以金星朝向地球的反光面大小也会发生变化。当然,这种变化在天文观测中具有重要意义,一般情况下,用肉眼等短时间观测则

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

居如欣

现象仍照干不误,招摇过市。江西、湖南、广东的所谓“破格提拔”仍是“换汤不换药”。

所幸这次在查处这类事件中,真正做到了从严从重处理,而不是仅对当事人“一撤了之”,而是找出背后的推手。究竟是哪些部门哪些人造就了这次“破格提拔”。因为这类违规违纪事情要做成,仅靠一人之力是有困难的。必须有一张关系网,制造“火箭提拔”。因而这次共查处了有关人员达五个之多。这样做,为的是真正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机制,努力避免违规事件的再次发生。出重拳,下猛药,让扭曲规划的人付出代价,提高违规成本。

所幸的是我们纵然有千百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渣滓,同时我们也有令人鼓舞的革命传统。周秉德在忆伯父周恩来一文中讲到,周总理经常告诫家人:“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跟国民党不一样,就是我们不能搞裙带关系,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,一人得道,鸡犬升

台北地铁

施善生

人员站在那里,随时等候乘客的询问服务。地铁车站内的墙壁广告,很多是公益性,罕见商业广告。文明乘车和应急逃生类的广告比较突出,内容十分明了。

在台北,携带自行车可以乘地铁,单程票要80元新台币。坐轮椅的残疾人独自乘地铁比上海多,时有车站服务员会帮助推轮椅。车厢内的座椅摆设并不是千篇一律。我晚上回来坐的那节车厢座椅很少,两旁是可以靠立的简易钢管。估计或是专门给携带自行车乘客用的。

印象深刻的,还有台大医院地铁站内外的标识图。出口处内的“台大医院站位置图及转乘资讯”,比起上海更详细清楚得多。还有一张周边换乘公交线路的末班车时间图,下面有将近10条公交线路的末班车时间,以方便乘客换乘的选择。

从台大医院站上来,是一个宽大的平台。左右都有出口。靠自动扶梯的左边墙柱上,挂着一块“本站电梯位置图”,特别方便残疾人乘车。从自动扶梯上来的乘客,迎面就可看见对面墙壁立着一块鲜明的指示牌。上面清楚地标明:右边箭头的是二二八纪念馆、怀宁街;左边箭头的是公园路、凯达格兰大道。

一个还不是枢纽的台大医院站,其内外标识图竟然做到这样的精致,我不由得十分惊叹。上海最近正在强调城市管理要注重精细化。而精细化的内核,还是处处为市民方便着想,“人性化”理念。离开人性化,再依靠信息技术的精细,也是缘木求鱼。

星”越靠越近,月牙也来凑热闹,形成“金木合月”的“笑脸”,虽然蔚为壮观,但是,与UFO确是一点不相干。

其实,话说回来,把常见星体误认为UFO的情况,并不稀奇,甚至连天文学家也有过,唐纳德·霍华德·门泽尔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1955年3月3日夜,他在靠近白令海峡的北极地带飞行时,突然看到一明亮的UFO闪烁着红绿两色的光芒从地平线的西南方射向飞机。仔细观察后,门泽尔突然意识到这是天狼星的模糊形象,天狼星似隐似现是由于远处的群山挡住了星光的缘故。

由此可见,做一个UFO爱好者,得时时关注天体运行预告了,多观察、多分析,这样就能在睁开“火眼金睛”时做到心中有数,揭开UFO的神秘面纱。

而且,到了12月1日,两颗“明

天,我们不能有任何特权。”在不少革命回忆录中,也可看到革命前辈是怎样教育家属子女的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只是近几年来,这样的优良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发扬。

“破格提拔”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,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。“破格提拔”可以拓宽用人渠道,破除论资排辈,为年轻人脱颖而出提供更多机会。只要真正做到严格标准严格程序,武汉大学评出了具有真才实学的“最年轻教授”,照样获得舆论普遍的赞赏和钦佩。因为,这位生于1985年的邓鹤翔教授的学历资质和学术才华有目共睹,选聘过程恪守程序,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公正的透明。这说明公众并不会非理性地质疑所有年轻人的能力。

归根结底,“破格提拔”干部一定要从严,做到严格标准,严格程序,严明纪律,坚决整治不正之风,确保选人用人风清气正。而在这方面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承担着重要责任。要坚持原则,勇于担当,公道正派,选贤任能,坚持以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,坚守选人用人的政治责任,坚决抵制不正之风,切实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。

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景点,如果有人随地乱扔垃圾,你在边上看到会怎样?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儿子。他说:“我会把垃圾捡起来丢进垃圾桶,然后用目光鄙视他。”

鄙视他,太对了!鄙视,有时是用目光,有时是用行动,有时不看一眼不着一字,也是鄙视。

上周末,与家人游黄山。在光明顶附近有一处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块,附近有厕所,各旅游团队都将此作为登山途中的休息地。一二百平方米的区域,竟像梅花桩一样密密麻麻放满了各种垃圾投放桶。场面壮观得让我有些疑惑,进而释然,不会遇到国内某些景点常见的乱扔垃圾的景象了吧。

正在这时,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游客打开一罐八宝粥,顺手把金属盖子往地上一扔。她自然而然的动作,在我心中却是一跳。正打算去帮她捡起来丢进垃圾桶,她又把平扁的金属盖子往地上扔去。我终于忍不住说道:“你边上就是垃圾桶,为什么不扔在那里面呢?”“噢,对不起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她立刻俯身捡起盖子丢进三步远的垃圾桶内。

她确实不是故意的,而是一种习惯,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。不仅是她一个人,而是一批人,不少的一批人,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。所以在黄山的石阶边、山道上,几乎五步一个,十步一处,管理方精心妥帖地设置了垃圾桶。即使这样,仍能看到被随手丢弃在路中间的塑料袋、彩色雨披、饮料瓶。

这些密布的垃圾桶和偶尔撞见被丢弃在山道上和树丛间的垃圾,是那么刺眼,像一个个符号,表述着管理方的无可奈何,放大着某个人群的生活细节和习性。而这人群是我的同胞。

扎在心里还有一根刺,就是到处可闻的喧哗声。在黄山售票处,排在我后面的好几个游客扯着嗓子打手机,不知是何处方言,更不知讲的是何内容,只感到一波一波的声浪在耳边震响。我听不清售票员的讲话,售票员也听不清我的讲话。我不得提高声调,仍然无效,只能比划手势。在屯溪老街一座仿古徽州风格的饭店,点了几样地方风味小吃,却不期然被顾客旁若无人地讲话声、小孩的吵闹声包围。而那过响的饭店背景音乐,此时更像是噪声大合奏中的一个声部。

在每一个观景点,都逃不过导游恣意的电喇叭声,“205团的朋友们,请往前走,请往前走!”“这块石头,像一只兔子,前面的树枝像不像草?所以这个景点叫作兔子不吃窝边草。”与此同时,几乎在每一处有人群的地方,都有那么几个人在大大地打手机。

有中国人的地方,就有喧哗声。我无语,无奈。儿子却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:“你讲话声音也很响!”

是吗?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啊!改变,从自己开始吧!从此以后,在公众场合接打电话,我一定要放低声言。



书评刊物之重要



用目光鄙视他

胡健



垃圾桶。即使这样,仍能看到被随手丢弃在路中间的塑料袋、彩色雨披、饮料瓶。

这些密布的垃圾桶和偶尔撞见被丢弃在山道上和树丛间的垃圾,是那么刺眼,像一个个符号,表述着管理方的无可奈何,放大着某个人群的生活细节和习性。而这人群是我的同胞。

扎在心里还有一根刺,就是到处可闻的喧哗声。在黄山售票处,排在我后面的好几个游客扯着嗓子打手机,不知是何处方言,更不知讲的是何内容,只感到一波一波的声浪在耳边震响。我听不清售票员的讲话,售票员也听不清我的讲话。我不得提高声调,仍然无效,只能比划手势。在屯溪老街一座仿古徽州风格的饭店,点了几样地方风味小吃,却不期然被顾客旁若无人地讲话声、小孩的吵闹声包围。而那过响的饭店背景音乐,此时更像是噪声大合奏中的一个声部。

在每一个观景点,都逃不过导游恣意的电喇叭声,“205团的朋友们,请往前走,请往前走!”“这块石头,像一只兔子,前面的树枝像不像草?所以这个景点叫作兔子不吃窝边草。”与此同时,几乎在每一处有人群的地方,都有那么几个人在大大地打手机。

有中国人的地方,就有喧哗声。我无语,无奈。儿子却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:“你讲话声音也很响!”

是吗?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啊!改变,从自己开始吧!从此以后,在公众场合接打电话,我一定要放低声言。

十日谈

明起刊登一组《我与儿童剧场》,责编:刘芳。